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八）

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全力推

出张志新系列报导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秘闻不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40年》，1991页）中说：

从1979年6月5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3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86篇（幅），约15块整版，14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1979年5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四天夜以继日的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五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1998年7月21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60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2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

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之日，在改革开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得，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20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

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 张志新确有“第三者”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曾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说我姐姐有“作风问题”？陈对此避而未答。

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张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我对不起你们……这句话是双关的，既有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疚。但那时陈觉得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她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但她惟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同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道德过失，她愿坦荡认错。

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

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与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四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神。

◇ 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象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 转载自《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 ∞ ∞ ∞ ∞ ∞ ∞ ∞ ∞ ∞

第一次“联动”大会目击记

• 百 虎 •

最近读了路人的“故园三十二年前”（z k 9 8 0 7 a）及赵淮海的“也说封杀不了的造反派历史”（z k 9 8 0 8 c）两篇大作，颇有所想。三十二年前的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可惜两篇文章多了些嘻笑怒骂，却少了史实的份量。本人以为既是“文革博物馆”的馆藏，大多应是回忆历史，少些评论。可记得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教诲？路文中提到孔丹、秦晓、谭力夫确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人物。此外更有彭小蒙、宫小吉、骆小海、郑中维、纪三猛以及蔡东北等等诸君，风云一时，斯人何在？

赵文中提到“联动”大会，多年来似乎鲜有人知。本人亲身经历，印象尤深。借此机会记下片断所闻所见，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当事人写出有关三十二年前北京红卫兵的回忆。

第一次“联动”大会召开于1966年12月26日晚北京展览馆剧场。与会

者多是四个月前的“红八月”时大出风头的“红卫兵小将”。当时有诗为证：

八月十八贯长虹， 碧空万里舞东风，
天安门上登小将， 金水桥前立群雄。
指点江山凌云志， 横扫四旧汗马功，
红卫天兵惊世界， 万众欢呼毛泽东。

不想好景不长。老毛翻手云雨，加之中央文革小组挟天子以令诸侯。年关未到，小将们早已风光不再。铛银入狱者有之。当时有诗为证：

遥忆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且看今日送果人， 戴着手拷把牢坐。

如此背景下，联动大会开张。本人家距会场不远，故约两小伴前往看热闹。无票在手，前门进不得。只好旁门伺机。苦等良久，忽见江克出来，此人乃小伴兄之好友，因此好说。恰巧此旁门直通大台，故我等便落入大会主席团行列。且看台上，数十人等，身着黄绿军装，臂戴尺长袖章。此类袖章，全无一字，正面红缎，反面白绸。谓之曰“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再望台下，人头簇拥，全场爆满。各个装束，大体如此。有趣的是，与会者虽多为联动及其乡党，但也不乏反对派人士。因此各呼各的口号，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文革初期“大民主”之风气，此时尚存。主持大会之人是一小姑娘，据说名叫周春英，乃是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之女。在她指挥之下，众人上台慷慨陈词。时间久远，许多闲话难以回忆。只记得台上台下，“打倒三司！”之声，声声不绝。说也难怪，此时大凡中学生中，联动的反对派势力薄弱，李东民为首之红卫兵首都兵团尚在襁褓之中。处处打压联动的先锋，倒是蒯（大富）司令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即“三司”是也。此三司人等，仗有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撑腰，拉起一面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旗，月把功夫便将“小将”们打得招架不及，实是欺人太甚。当时有诗为证：

满天风雨满天愁， 革命何需怕断头，
留得联动豪气在， 十年归报三司仇。

世人皆知，三司后台是以江青为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打倒三司自然涉及反老毛的婆姨江青之嫌。反革命的帽子不难戴上。半步桥监狱事小，为此吃枪子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惧之？！石油学院附中一条不要命的汉子跳上台来，大呼“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顿时全场哗然，众人应声高呼。群情激奋，几乎话到嘴边，只是无人喊出打倒江青罢了。也有人大叫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既然反对派人士在场，总要让他们说说话。只是一位先生声音只说一句话，半句未出口，便被哄下台。激情过尽，悲从中来。众小将回想几月前的风光对之以今日之凄凉，颇感冤枉。于是乎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归唱，心里却有所想：老毛倒底要干什么！？

大会开完，已过午夜。接着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片中游击队员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霎时间全场顿时群情激昂，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横飞，口哨乱响。真正是充满了革命党人的热情，法西斯式的疯狂。

电影演毕，已是凌晨四点多，众人余兴未销，蹬车前往公安部解救落难的弟兄。这便是史载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只是本人实在懒乏难忍，回家睡觉去也。

三十二年前的联动及联动大会虽然充满了少爷造反的气味，却是文革中第一次公开，有组织及大规模的抵制毛泽东及其爪牙中央文革小组倒行逆施的行动。许多

与会者从此心里明白，再也不上老毛的当！

“十年归报三司仇”。七六年四人帮垮台，本人振臂高呼压在心里十年的话“打倒江青！”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次联动大会的会场。

北京早期红卫兵的历史虽短，却流下了许多颇具争议和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诸如红八月，西纠，十六纵，联动，六冲公安部，红卫兵组歌等等。希望当事人等，不论是褒是贬，写出回忆文章。也算应了蒋经国先生留下的话：“对历史有个交代”。

□ 98年8月于美国 hu_bai@hotmail.com

∞ ∞ ∞ ∞ ∞ ∞ ∞ ∞ ∞ ∞

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

• 李德生 •

（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正式宣告林彪反革命集团精心策划的政变终于流产。近年来出版和发表的不少书籍与文章，已将这一事件前后的许多细节披露于世。最近在《纵横》杂志上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的回忆文章，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现摘录如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我们的讨论停了下来。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

、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当时，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凌晨三时十五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周总理批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周总理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他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待一切安排妥当，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中午。下午二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采取了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戒备以及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

在十三日迫降直升飞机后，根据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十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几个秘密据点，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在短短一、两天内，将这些正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北京和外地收审的人员先后集中在西郊亚非疗养院内，开始，他们并不老实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要誓死忠于“林副主

席”。直至告诉他们林彪已经叛逃摔死，他们一个个才象瘪了气的皮球，那种一再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也不知跑到哪去了。

此后，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首先是直升飞机迫降后，从这架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罪证，其中有林彪的反革命手令，大批机密文件和美金等等。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手令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手令撕成几十块碎片，当部队、民兵在现场搜集上缴后，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几人一起辨认，他亲自仔细拼对，确认是林彪亲笔所写。这就证据确凿地证明，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头子是林彪。

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的投案揭发交代，也起了重要作用。

到九月十四日中午，我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利用中午时间把我安排到京西宾馆休息一下，我刚躺下，军委一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当时我想，我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四十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怎么现在出现了呢？我让秘书与他联系，他说自己想投案揭发重大问题。我顾不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马上叫他来见。

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他那红肿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不断地流着眼泪。我听了很吃惊，原来只认为林彪要阴谋篡党夺权，竟然还要谋害毛主席。鲁珉当时还揭发交代了林彪一伙其他方面的罪行。他谈完之后，我让他在揭发交代记录上签了名，立即将这一重大揭发材料送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很快给我来电话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

后来把鲁珉收审到亚非疗养院时，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不派专人看管，允许他与妻子孩子同住，允许他自由活动，这其实是在体现坦白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

□ 转载自《美洲文汇》

∞ ∞ ∞ ∞ ∞ ∞ ∞ ∞ ∞ ∞

毛主席烧了林彪的第一号令

• 汪东兴 •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

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略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 摘自《中国老年报》 原载《汪东兴回忆录》

~~~~~

【往事追忆】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革中的庐山五大名寺

• 散宜生 •

三十年前，1966年的初夏，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面的这篇短文，只是记录了对庐山这座文化名山在十年动荡的末期的一点印象，算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对那个纷乱的时代作一点管中窥豹的回忆。

(一)

文化大革命里，各地的名胜古迹破坏很多。不过，到了庐山，你却很难找到“打、砸、抢”的痕迹。这里毕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会的地方，红卫兵小将还不敢随意撒野。

山顶牯岭的房屋道路都修理得很好。白居易当年徘徊过的“花径”里，依然是诗人吟诵过的晚唐景象：“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那一份艳丽，为初夏的游人带来突发的惊喜。甚至“反动分子”的“反动”题词，也保存得好好的。就说明代大儒王阳明吧，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是七四年开始的那场“批林（彪）批孔（子）”运动的批判重点之一，但是大天池的天心台上，赫然有着他的用大字镌刻的一首诗：

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这显然是一首哲理诗，是指一种无欲自刚、心中存了天理后意志不为人间势力所动的境界。饶是如此，却也未遭到水泥涂身的噩运。

似乎一切都不错。如果你是从九江坐汽车或自北面的好汉坡上山的话，感觉确实如此。不过，你要是自西面的“赤脚好汉坡”上山，那就要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象了。

“赤脚好汉坡”，这是二十年前两个光着脚板穿解放鞋（文革时流行的一种军用球鞋）的年青人对一条山路的称呼。第一次上庐山，没钱坐车，跟着车子扬起的尘土走大路，也是爬的山北的好汉坡。第二次上庐山，查了前人的书有备而来。当时，看古书要党委介绍信，我们开了一张批判苏东坡的（他老先生算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在图书馆里翻了一大把地方志，拟好了游览路线，决定从西林寺上山。就这样，我们撞上了“赤脚好汉坡”。

西林寺？对，就是苏东坡题了“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那首《题西林壁》绝句的西林寺。西林寺大名鼎鼎，倒也并不神秘难找，从九江市坐火车往南的第一站是九江县城（沙河街），出沙河街，过陶渊明墓，往东走二十里，就是建于东晋太元二年（公元377）的西林寺。

应该说就是西林寺的遗址。大名鼎鼎的西林寺，连半堵残垣都没能留下。文革初期就拆掉了。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剩下的，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西林塔。这座建于唐代的六角七层的砖塔，下面几层的木梯也被拆掉了，上不去。砖缝嵌着绿苔；塔顶长满茅草，成了乌鸦窠。看来当地老乡的技术手段不怎么样，否则，早把这座塔也拆了垒房子去了。

看着周围正在抽节的满是生命力的青翠的水稻，觉得这座灰糊糊的破塔好凄凉。

与西林寺隔开一条公路，就是只比西林寺晚建了七年（公元384）的东林寺。东林寺运气不错，围墙还在。墙里墙外都堆着陶罐，看不出墙上曾经写过些什么。东林寺的房子虽然也拆掉了，但是地盘仍然得到充分的利用。地上用水泥砌了一方一方的池子，里面都是铁锈色的液体。寺里弥漫着一股怪味，原来是个土化肥厂。按说本人在农村也混了多年，却仍然看不明白他们在鼓捣些什么玩艺。据老乡说，砸碎的菩萨和刮下的香灰，就做了第一锅化肥。

东林寺为东晋高僧慧远所建。慧远被后人推崇为净土宗始祖，东林寺就成了净土宗的发源地。净土宗在唐代由鉴真和尚等传入日本，蔚为大宗，因此东林寺在日本也很有名气。如今圣洁的净土被改造成腌（月赞）的肥料，只有几株古樟树，依然绿荫如盖。

我们从西林寺上山。方志上说是十八里山路，不算长。我们却没料到这是如此难走的十八里。庐山靠长江的西边，水土保持很差劲（靠鄱阳湖的东边要好得多），山坡上没什么植被。我们走的路，是山水冲出来的。冲走了泥土的小路上，尽是有棱有角的小石块，一脚踩上去，脚板只有二、三个点是着力的。解放鞋的底又薄，连山里人都觉得这滋味不好受。路上也修了一些台阶，不过那台阶往往有膝盖那么高，而且这样的台阶可以连来十几个，累得我们每爬一格，就大叫一声“赤脚好汉坡！”

本来估计，最多三小时就能爬上去的，结果走了近四个半小时。其实，离沙河

街十里的赛阳镇有直上大天池的青石板路，我们是因为执意要看西林寺，才走上了这条早已废弃了的小路。

后来两天，沿着小天池、大天池这一线在山上游玩时，总是一眼就看到山下的孤零零的西林塔。要不是去过那里，你大概不会注意到它。对别的游人，我猜想，那不过是眺望长江时几座刹风景的破房子而已。

## （二）

西林寺和归宗寺、秀峰寺、栖贤寺、海会寺是庐山五大名寺。它们以这个次序，散布在从西北到东南的山麓半圆上，离公路都不远。五大名寺之外，这一条山麓半圆上另有不少名胜，最著名的要算是位于栖贤和海会之间的白鹿洞书院，曾经是朱熹讲学的地方。自认是比较传统的读书人，当然要去白鹿洞敬悼前贤，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这五大名寺中，房屋保存得最好的是秀峰寺，因为它在当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所在地。党校那些秀才还有两下子，居然会想到占据这样一块风水宝地。

秀峰寺为南唐中主李（王景）所建，原名开先寺，李（王景）做太子时曾在寺里读书。寺院规模宏大，寺前的空地足够停放官员们的轿车。原来的经堂改建成了礼堂，放满了长条椅。寺里有许多碑刻，黄庭坚的《七佛偈》，这块庐山现存的最早的宋碑就在这里。除了残剩的房屋之外，这是开先古寺所留下的唯一的遗产了。我们去的那天，党校正在开会。官员们热了，把中山装脱下挂在碑上，正好遮掉那些“封建主义”的内容。

秀峰寺的背后，是双剑峰和香炉峰。两峰之间，袅袅而下的，就是被李白誉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岩瀑布。在漫长的岁月中，瀑布从岩石上切出一条流向鄱阳湖的通道，构成了庐山景色最幽深的青玉峡。

青玉峡的两边都是陡壁。黄岩瀑布在流近峡口时，突然一个大拐弯，有如白龙逞怒，在溪谷里踢出五、六个水潭，一个压着一个成阶梯形。紫绛色的溪石上，一条条白练轰隆隆地注入下面的水潭。就这样一级又一级的，一直注入最下面的泓深潭。

一道又弯又小的石拱桥横锁峡口。桥东的岩石上刻着“青玉峡”三字，旁边有个称作“漱玉亭”的小石亭。从漱玉亭下到泓深潭的岩石上，刻满了各色题镌，后来者已无处插足。这是我在名胜风景区见过的密度最大的石刻。

泓深潭边，有块石头，是个天然的靠背椅。坐在上面，双脚正好垂进潭水。水意清凉，丝丝沁入肌肤。几步路外，就是纷嚣的人间，却望不见路尘，也听不到市声，都被秀峰寺和公路之间的茂密的松树和竹林隔断了。

苏轼有一首题为《开先漱玉亭》的诗，吟的就是这里的夜景。诗的最后两句说：

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这里讲的是《庄子·让王》篇中的一个故事。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你本来也是种田的普通人，却老去尧那里转悠，（终于获得了帝位，）这还不够，还要我也做这种丑事？大爷再也不要见你！”说完就自投清泠之渊。苏轼为青玉峡的幽静所感召，自觉做官没意思，要手持着纯洁的白莲花，跳下这泓深古潭

。回想秀峰寺内那些神色沉重的开会的官员，不知又在为中共的党内第几次路线斗争而烦恼，我和朋友对望一眼，脸上都泛起会心的微笑。

### （三）

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的栖贤寺，唐代极盛时期住过五、六百僧人，论规模，是五大名寺中最大的。如今风流已去，只剩旧屋一栋，成了庐山林场的职工宿舍。拉木头的卡车来来往往，看上去又脏又乱。我们那天还见到了一辆日本进口的重型载重车，正在卸水轮机，计划在溪谷上游修建小水电站。山顶早已建了大坝修了电站，为此还毁掉了庐山瀑布中最早记入史册、在酈道元的《水经注》里就已经提到过的石门涧。我抬头四望，明明看到从公路边拉进来的电线，这里有电。再修电站，大概是为了“备战”吧。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了防备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发生的美国和苏联的联合进攻，就是公社一级也要坚持“自力更生”，努力做到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独立生存、独立作战。

不过，这样一来，会不会毁了这里的山涧？至少，水源可能被污染吧？栖贤寺旁的溪水，是从山顶的含鄱口下来的，流到山麓，就成了茶圣陆羽品评过的“天下第六泉”。溪谷边的竹林里，本是品茗聊天的好地方。现在写有“天下第六泉”的石亭的柱子上，却贴着毛泽东的诗——“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放在这里不知道算什么意思。

溪上有一座建于北宋的石拱桥，大概是和尚化缘造的，起名观音桥。在宋代，这里是和秀峰寺黄岩瀑布齐名的另一名胜区。从观音桥往上游走，溪谷里一块一块绛色的巨岩间，散布着一个个碧绿的水潭。据说是深不见底的玉渊就在那里。从观音桥往下游走，则是乱石堆垒的小三峡。

坐在小三峡的乱石上，听着见隙就钻的溪水在乱石间奏出叮叮咚咚的乐声。抬眼向上游望去，远远地隐在云中的含鄱口，观音桥和小三峡中的乱石，远、中、近三景，相配成天然画图。这三景又被溪水一线贯穿，是摄影的绝佳去处。桥上要是站个红衣少女，则更有点睛之妙。

观音桥有一点奇特：以桥为界，上游的石头是紫绛色的，下游的石头却是土黄色的。低眼向下游看去，似乎是一群披着袈裟的和尚横七竖八地枕藉于溪沟之中。是栖贤寺的从前的主人，被强闯进来的住客扔出来了吧？

### （四）

庐山五大名寺中，要说还保存了一点历史上的意义的，只有年岁最久的归宗寺了。

“归宗”不但是寺名，而且还是镇名，这镇还不小，由此可以想见归宗寺昔日的声望。据说归宗寺原是王羲之的私宅，王羲之曾任江州刺史，调离时，他把房子舍给了西域僧人达摩多罗，首开庐山建寺纪录。

老乡把我们带到寺前，我们困惑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这栋看去普普通通的二层平房，原来就是从前的寺院；而那扇有如一般农家所用的方形木门，已代替了寺院应有的圆顶洞门。幸好门大开着，否则我们可能还不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里面的人，都在忙着干木器活。现在这里是公社的木器社，改建个屋顶、大门的，还不是小菜一碟？

象秀峰寺一样，归宗寺的背后，也是一条瀑布，名为玉帘泉。不过，秀峰寺的黄岩瀑布象伟男子，“劈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苏轼《开先漱玉亭》），在山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玉帘泉更象害羞的少女，在峰峦间半藏半露。我们上坡追逐她，却不是被树木就是被山峰遮住了视线，总也看不分明。只知道在艳阳下，夏日的墨绿山峰间，有一道白线亮亮闪闪。

没有足够的时间远上泉源，我们还是回到归宗寺。当时的农村，香烟是紧俏物资，撒了一圈上海的飞马牌，木匠们立即为我们叫来一位文革前的和尚，让他给谈谈归宗寺的事。老陈现在是漆匠，旧罩衣上都是油漆，一眼看去，也分不清哪是补丁哪是漆斑。

据老陈说，玉帘泉后有个山洞，泉水泻下后，正撞在一堵石壁上，反弹至洞口，水珠细细的，有如飘飘扬扬的春雨。他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们说，他也已经有十来年没上去了。

说者听者皆默然。我又递给他一支烟，问他王羲之练字的墨池在哪里。老陈把我们带到院后，指了指一个两丈见方的水池。“从前那些官僚啊，没事，就写写字。”他搓搓满是漆垢的手，有点愤愤不平地说。

尽管很同情他，我们还是走上几步，靠在几乎就要塌掉的栏杆上，仔细看看这传说中著名的墨池。水很浅，也脏，水面上还漂着树叶和菜皮。这就是王羲之每天饱餐了玉帘泉的灵气之后，练字时洗笔洗到水黑的墨池？

这时，有个木匠匆匆走到池边，往手中的墨斗里加了一点水，又匆匆地回屋里去了。

从墨池到墨斗！我一拍大腿，不由得奇怪，秀峰寺里那些党校的秀才，怎么会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宣传题材？从前是“封建官僚”洗笔的墨池，如今这水却装进了劳动人民的墨斗，在一穷二白的光木板上，弹出了最新最美的航线①，指引着斧子锯子大干社会主义！

这不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象征？

## （五）

我们从西林寺的小路上庐山，下山时走的则是经过三叠泉去海会寺的路。

三叠泉是庐山最值得一看的景致。买一套庐山的明信片，比较一下，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素有“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的说法。但是，三叠泉不通公路，而且离开牯岭远达三十里，一来一回要六十里。即便是往山下走，从三叠泉到山麓的公路，也有十六里。要去海会镇坐汽车，还要再加五里路。游庐山的人，几乎都在这些数字前停住了脚步。

到三叠泉不但路长，甚至有危险。我们那天要赶路，起得早，做了招待所食堂的第一批顾客。饭师傅们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走错路，拐上了雷达站。雷达站是保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的重要设施，我们要是未经许可就见到了天线的模样，说不定会被部队扣起来审问一番，查查是不是美国特务或台湾特务，那时麻烦就大了。

一般总认为，下山路不太累。不过，去三叠泉的路，并不完全是往下走，途中

要翻过庐山第三高峰大月山，因此有相当一段是上山路。当然上山路也并不那么可怕。住在牯岭中心区的人属于城镇户口，但在中心区边缘的山居里的农民，却是农村户口。要上学，他们的孩子不能去牯岭，而要去位于牯岭与大月山之间的山坳里的一个村庄，每天都是十里下山路十里上山路。我们那天就和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一起走了一段。孩子们说，他们已经想不起上次见到游人去三叠泉是什么时候了。

三叠泉有三百多米的落差。上叠从悬崖喷射而出，顺着崖壁流到一块巨石上。巨石下的崖壁是内陷的，因此中叠不是依着崖壁、而是凌空跌下，看上去倒象是条宏大的白石柱。如果说上叠在崖壁上跳跃飞溅，显得调皮活泼有如孩子，中叠则庄严稳重有如成人。中叠下的岩石，被水砸成一个大洼洞，水流进去不见了，要到下叠处的石缝，才分为两股重新流出。这一特色，在别的地方还没见到过。要论姿容，三叠泉是可以与东南第一名瀑、雁荡山的大龙湫拼一拼的，虽说水量没那么大。

奇怪的是，在路边的观瀑亭，见不到三叠泉的全貌。我们在悬崖边找了好久，才找到了最佳观赏处，终于把三叠泉尽收眼底。

三叠泉对面，还有一处好景致，更胜过大天池的龙首崖。一层长石象跳水跳板似地在悬崖尽头伸出半空，直指长江，龙首崖可算牯岭最奇特的山景，庐山牌香烟的盒子上，画的就是它。三叠泉对面的直指鄱阳湖的“龙首崖”，气势则更要大得多。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悬崖边坐下。没有了汽车喇叭的日日鼓吹，没有了进口相机的忙碌捧场，只有三叠泉，只有“龙首崖”。这一份小心，渐渐地融化为无所萦怀的安宁。

## （六）

从三叠泉向南望去，瀑布两侧悬崖的开口处，就是我国第一大湖鄱阳湖。王安石有句诗，把这情景形容得非常贴切——“两山排闥送青来”。就象我们走到这里，吸一口带着三叠泉的水清味的长气，抵掌展臂向左右一推：两边山崖如滑门移开，门开处，涌进了湖水，涌进了阳光。

从三叠泉到海会寺，我们一路上，就是把这两扇门一步一步地开得更大。等到走到海会寺，我们终于面对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的全景。

海会寺虽说在山麓，但是比起湖面，地势还是相当地高。在寺前极目南望，隐隐可以见到赣江口和信江口。眼力再强一些，大概还能分辨出抚水，修水和鄱江。何谓“九江”？有一种解释，说是指赣江和它的八大支流。这里九江汇注，如百川归海，故称“海会”。在寺前向东北方向望去，则可以见到耸立湖中的虾蟆石，和远处的湖口的大孤山。

建于明代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的海会寺，如今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个教学点，里面挤满了学生。说他们“挤”，不但是因为学生多，地上的乱稻草上横七竖八地摊满了铺盖，而且是因为不睡人的地方堆满了竹枝和由竹枝扎成的扫把。上山砍竹子是学生们的日课，晚课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所谓的新型“大学”，是按照毛泽东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所建立的。当时有个叫《决战》的电影，说的就是在江西共大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代表是如何站胜资产阶级的“反动教学路线”的。共大去招生，党代表大声问道：“什么是（入大学的）资格？”他老兄

高举手掌：“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人们的私下谈话中，这事一时传为笑谈。不过，如果进大学后学的就是怎么扎扫把，确实还是手上有点老茧的好。

虽说保存得不如秀峰寺，相对的讲，海会寺还是比较运气的。学生不是木匠，不至于翻造房屋；学生也不是农民，不会为了几块砖瓦就扒了庙。只是人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他们在走廊里，竖几块砖头，就算一个灶。一排走廊，七、八个灶，把墙壁熏得黑黑的。

总算旧房子还在，所以我在寺门上就看到三个大字——“真面目”。上山时我们去西林寺，就是要寻找这几个字，或有这几个字的那首诗，却连个寺都没找到。下山了，我们已经不存指望了，怎么反而碰上了。为什么“真面目”这三个字要题在海会寺？

一位共大的学生带我们退开几步，然后示意我们仰起头来。

五老峰！

第一次上庐山时我去过五老峰，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很普通的一座山峰，甚至看不出五个老人都在哪里。山上有五老洞，更是不值一提。要论山势，杭州的玉皇山比五老峰不知低了多少，但要说到洞，连玉皇山的紫来洞都比五老洞要有味得多。李白有诗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我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写出来的。猜想纯粹是大诗人恣肆的想象——直到我在海会寺、在庐山的东南见到了五老峰。

与山北的灰色截然不同，青莹莹的五老峰，在寺后直插云天。五老峰一美在颜色。从这里往南，山峰带些绛色黑色；从这里往北，山峰多是灰色。只有五老峰别出一格，青光晶润，色泽澄明。五老峰二美在气势，五老一字排开有如屏风，即使在两端，也没有绵长的缓坡。五老峰三美在峰尖的弧线。五老的头和肩，就是八、九个碧峰，有圆有方有尖，既有较为平和的连接，也有突然的断裂，形成一道深深切下的豁口。在蓝天下，只觉得所见的是一个庞大的示波器屏幕，峰尖的弧线所显示的，正是我此时的放大了千万倍的脑电波。

我们后来才知道，只有在海会寺，才能见到五老峰的全貌。不管是沿公路向北走还是向南走，五个老人都会很快地相迭在一起，变成一座普通的山头。

这才是庐山的真面目。

外国传教士首开在山北避暑的风气。国民政府要在江西剿共，选中庐山就近开训练班，在牯岭造了不少房子，供高官和德国高参居住。共产党全盘接收，毛泽东住进了蒋夫人的公寓。牯岭现在成了庐山的中心区。新旧建筑，中外杂处；东西游人，华洋混流。熙熙攘攘，每天热闹得紧。

但是，在历史上，庐山的精华，却是在东南部的山麓。从海会寺向北不远，是传说中的李白读书处九叠屏；向南不远，是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朱熹……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名字，都曾在这一带活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不管庐山顶上怎么折腾，毛泽东今天可以打倒彭德怀，明天可以批判林彪集团②；也不管庐山的名寺还剩多少砖、多少瓦，我辈今日登临胜地，在青山大湖之间，在溪石上，在竹荫下，中华文化的韵味，仍在氤氲而来。这里就是大自然，这里也就是传统的山水画，也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意境。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本书能告诉我们庐山历史上的这些光辉名字，我们就有厌弃那些无聊的噪音、回首面对真面目的胆识。即使这些名字都被抹去，在老和尚的满是油漆的破烂衣衫下，在共大学生的仰望五老峰的眼神中，在从牯岭走了五十里山路来到海会寺的年青人的血脉里，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总有一天，他们会把这些名字重新唤回。

注① 毛泽东在1958年说过一段话：“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注②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打倒了彭德怀“反党集团”。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集团。一年后，林彪外逃，机毁人亡。

□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

【自由论坛】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革命是一把火 ——严家祺谈文化大革命及其影响

• 李 漪 •

九七年一月，严家祺在柏克莱加大东亚研究所的讲坛上评论“文革及其影响”。他一开始便感慨万分地讲：

“今天我们重新来看三十年前的文化革命，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今天中国有很多资本家，而且确实象林彪讲的，他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可以打倒，但现在不是被打倒了，而是站起来了。而且都是共产党员。当年我们想，资产阶级怎么能在我们共产党内呢？按照列宁的阶级划分学说，共产党里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三十年以前说的话，可以说有幸言中了，今天看对中国有特别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他说党内有资产阶级，要打倒党内走资派。这几年的改革开放，造成中国的资产阶级化，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严家祺接著这么描绘中国的变化：“我首先要讲的是究竟怎么样来分析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制度，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基础上的自由企业制度。今天苏联东欧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而且中国也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按照德国的经济史学家熊贝特所说资本主义可以分三个阶段：早期、全盛期、晚期。二十世纪后走向晚期。按照他的分类，资本主义很早就发生了，在古代时候的罗马到十六世纪中期是早期资本主义；然后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叫完全资本主义时期；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现代时期。

“以我们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特别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将要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微软公司的总经理比尔·盖茨准备做一个计划，他要在地球的外层空间，放置八百四十个人造卫星，造成一个人造卫星系统的网络，他的这个计划叫做 T E L D I S，建成这个计划后在二〇〇一年，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在室内，或是在沙漠里，在野外，在海洋上，甚至在西藏高原，都可以用电脑来进行联络，完全是无线的电脑网络。如果是这样，我想真正的地球村是会建立起来了。在二十一世纪，在电脑方面这样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我说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可以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第一个全球通讯公司，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分割消失了。第二是科技本身的产业化，科技的研究、科技的推广、科技的发现和发明，包括技术展览，现今我们还不能谈得上是一种产业，只有少数人在做。到了二十一世纪，整个科学技术本身就产业化了，这是一个新的产业。第三是资本的全球流动率将会大大地提高，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而且这些跨国公司会造成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在很多国家里面生产商品，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一些发达国家就成了商品的设计者和高档商品的生产者，使商品生产分化了。中国现在就很高兴，很多资本投向中国，建立了那么多工厂，使沿海地区发展得很快。而西方、美国也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使他们成了新商品和高技术商品的设计者和生产者。我们看到在落后的时代，也就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落后国家，由原料产地变成了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现在转移到了非洲，可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其实真正高兴的是发达国家，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快，走向更加的尖端，这个趋势在二十一世纪会越来越烈。第四是地方自治，地方环保同社区建设、地方自治有了高度发展以后，地方自治机构以及国际组织逐步就会侵蚀原来的地域、原来地域的国家主权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的发展过程中间会有反趋势的出现。比如中国就会说我的国家主权重要，谁要独立也不行。但实际上社区独立，地方自治的概念会在二十一世纪出现。

“由此，我们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早期阶段是不是由古罗马、希腊开始或是什么时候开始并不重要，总之那是个早期资本主义的阶段。而我说第二阶段比较重要，第二阶段就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整个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弊病，这个资本主义就产生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马克思，还包括后来的列宁。正由于马克思的产生，造成了整个二十世纪天翻地覆的革命，世界性的革命：中国、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化，但经过二十世纪，证明了这是个失败的尝试。为什么失败呢？毕竟这些国家本来就是落后的国家，又用计划经济、专政权力，就造成了斯大林、毛泽东时期的很多灾难。而资本主义在美国这些国家却进入了第三阶段，在1929年整个西方危机之后的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政府就开始介入经济，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政府就开始调节经济，罗斯福施行新政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个阶段应该叫做有调节的、有福利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发展不同，不少北欧国家，福利搞得非常厉害。当今的美国，可以说仍然处在第三阶段，延续了罗斯福、约翰逊的资本主义路线，这就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

“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呢？是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责备的那个资本主义、是会产生工人运动的资本主义，可能会产生工人革命的资本主义。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成立海外工运，徐邦泰应该成为工运的头头，而不是民运组织的头头，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共产主义的运动。但是对不起，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产生。原因就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实现已证明它是失败的，失败地出现了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出现了中国的古拉格，也出现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那样的大屠杀，出现了这么多的灾难，出现了‘六·四’。中国国内的条件本身是有产生共产主义的机会，产生工人运动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看文革，文革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它是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

，一方面反对在共产党掌握权力情况下的官僚专政的运动。它要继续革命，它要阻止在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资本主义进化的运动。看毛泽东的很多言论，再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那本书里批判的布哈林等人的言论，统统都是一种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要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革命的理论。中国在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西方国家里面，象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967年底到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的运动也非常激烈。文化革命不完全是中国现象，当中国文化革命的“风”传到西欧，传到日本包括美国之后，美国也造成一种新的运动，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美国，尽管已是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也有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也比中国问题小得多，是一个进步中间的问题，但它毕竟有问题。那些受到中国文化革命影响的美国左派分子说：我们是为了进步，我们的资本主义不能停留，我们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文化革命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在讲文化革命及其影响的时候，应该很好的研究法国的“五月风暴”，研究日本的“全共斗”的问题，美国的文化革命现象。所以今天看文化革命中间的左派，那些歌颂文化革命的，对毛泽东、对周恩来、对文化革命、对江青歌颂的人，这些人还是对中国友好的人。他们看到美国社会里有些问题，他们看中国能够没有犯罪，又没有偷窃，没有黄色现象，那么乾淨。在文化革命中，他去中国旅游也没有被斗一下，他看到的都是好事情，因而感觉就不一样。那些所谓左派分子，我认为不必谴责他们，可以很好的理解他们，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世界性影响，文化革命这个运动经过二、三十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文化革命期间我原来是一个比较保守主义的分子，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的立场比较保守。正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就对邓小平1975年的改革、整顿，表示赞成。对邓小平、包括周恩来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是受到毛泽东损害的，而同情周恩来就是对在文革中过热的对毛泽东崇拜的一种反抗。但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1989年的六·四后可以看到，原来邓小平做的事情，和他在文化革命时做的事情、和他在文化革命以前做的事情原来是一脉相承的。而在文化革命之后，他之所以这么残酷，就是想到我这个权力再也不能失去了，如果我失去这个权力的话，第四次就不可能翻身了。所以在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采取周恩来的方式，毛泽东的方式，或者其他更好的方式，而他却采取了杀人的方式、大屠杀的方式来处理。造反派反对邓小平，反对刘少奇是有他的合理性，就是说文化革命的本身在发生的时候是有它的合理性。就象在西方社会里面受到中国文化革命的波及和影响有它的合理性一样。”

“今天来看文化革命。可以得到结论，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土壤。正是因为有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就造成了二十世纪天翻地覆的共产主义运动，也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冷战现象。今天是冷战结束了。另外可以看到凯恩斯思想的出现，有调节的福利资本主义出现，实际就是把共产主义产生因素消灭了……”

。

讲起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严家祺称“文化大革命”是一把火。“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法制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封建的、专制的以及落后因素的资本主义，还比不上产生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能产生孙中山的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不准纪念文革，你可以有限的谈谈民主，谈谈自由也可以，文革是不能谈的。那是一把火，如果点燃起来的话，中国就不得了。毛泽东一方面他是一个秦始皇，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是中国专制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专制主义者。但他毕竟是一个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巨人，他为中共赢得了中国大陆，尽管还有分裂，还是造成了中国的独立，中国站起来了，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造成了蒋介石时候的新的统一，使中国统一，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权；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现象，在二十世纪有过一次，二十一世纪再也没有了，二十二世纪也没有了，因而是永恒的研究主题。文化革命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来粉碎反对派刘少奇、邓小平，要取得独裁权力的一个持续性的和平的政变，也是多年的一个政变；也是毛泽东对抗世界资本主义、防止共产主义国家官僚化、资本主义化的重大努力。我是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上来讲资本主义化，反对资本主义的概念。

“文化革命对今天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中国今天进入了第二期的资本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可能引发一个新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文革的思潮在今天中国的抬头，可以成为动摇一党专政、抑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弊病的武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权力向资本转化的现象。

“文化革命是一场什么运动呢？可以按一位朋友所说的是‘红黑大战’，造反派里面当头的也有‘红’的，但‘黑’的比较多；保守派里面主要是‘红’的，‘黑’的比较少。保守派里面讲‘红黑’讲得很清楚；造反派里面尽管有‘红黑’但是不太讲，淡化了。共产党对‘黑’的‘红’的镇压是不同的，对‘红’的镇压，比如对‘联动’是非常轻微的，抓起来几个月就放走了。对‘黑’的镇压，象遇罗克就是判处死刑。而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镇压造反派的时候，残酷的程度超过了五十年代。清理阶级队伍，清理所谓的‘五·一六’（‘五·一六’到现在还没有翻案）的性质和共产党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类同的，是一个镇压国内人民正义反抗的运动。当时就有人说，‘红黑大战’要看二十年，二十年以后高干子弟要掌权。二十年过去了，‘红’果然取得胜利了。中国今天所有的岗位上，基本上是红的掌握了权力；那‘黑’的呢？在海外民运里面有很多‘黑’的，当然也不全是‘黑’的，也有‘红’的在里面，但基本上是‘黑’的；从海外民运填的表上看，基本上都有‘黑’的经历，这个‘红黑大战’今天还在继续。

“文革思潮的抬头有助于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跨入第三阶段，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如果不进入第三阶段，中国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当然不会出现共产主义革命。对今天的中国来讲，西方社会、西方国家象美国这样的国家进入到将要跨入第四阶段。今天中国的正确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停留在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尽快地跨入第三阶段。我看来有三件事情要做：一、加强法制建设；二、要推动政治民主化；三、保持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适当的干预、调节。在今天的中国一讲干预，一讲调节简直就是坏事情，本来第三阶段就是要做这个事情的。简单的自由竞争不可能把中国带到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化的社会，必须用第三阶段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另外，中国应该接受由二十世纪新资本主义，具有新资本主义四个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挑战，不要因为中国要翻几番好多外国企业都到中国办厂了就很高兴了，实际上那是一种倒霉，还是比美国等迈向第四阶段的资本主义落后了一大节。这就是今天来研究文革我认为所有的特殊意义。”

□ 原载《中国之春》1997年第4期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钟 超（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 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 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